【俄语文学】

《旅顺口》的中文版本嬗变与本土化改造

明子奇

【摘　　要】苏联作家阿·斯捷潘诺夫的《旅顺口》荣获斯大林文学奖后，很快被译介至中国。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多次再版这部作品，并采用改写、改编等方式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这部带有鲜明苏联意识形态印记的作品成为服务于中国国家建设和时代需要的文艺资源。中国针对《旅顺口》这一特殊文学文本进行的改造，反映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实诉求，体现出一种按照政治逻辑处理外来文艺资源的基本模式。

【关 键 词】《旅顺口》；阿·斯捷潘诺夫；文学版本；文学接受；本土化改造

【作者简介】明子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京），2024.5.134～145

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同时也是一个文学事件。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战争，不仅改变了东北亚乃至世界的格局，同时也影响了相关国家的文学创作。诸多作家围绕这场战争先后创作了一系列文学作品。此外，战争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也催生了一批作家。与日俄战争相关的代表性文学作品包括《辽天鹤唳记》《蜗触蛮三国争地记》《肉弹》《旅顺口》《坂上之云》等。在这些作品中，《旅顺口》因其独特的思想和政治内涵被译介至中国并多次再版，且被反复改写、改编。以之为个案考察该文本的译介及其中文版本嬗变状况，分析版本嬗变背后的改造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学接受状况及变迁过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外来文艺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学实践中所处的位置及发挥的作用。

一、苏联影响下的《旅顺口》中文译介

1944年，苏联作家阿·斯捷潘诺夫（一译为斯杰洋诺夫）所著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全书出版。[①] 1947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该书的中文本，其中有专门文字介绍称：“斯杰洋诺夫所著的这部长篇小说旅顺口曾荣获苏联人民委员会一九四六年颁布的一等斯大林奖金”[②]。可见，《旅顺口》当时在苏联大获成功，这也是其能够迅速被译介至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继1947年版《旅顺口》中文本面世后，中国方面又先后多次再版了这部小说，并对其进行改写和改编。目前可见的《旅顺口》中文版主要有如下7种：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7年版、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1962年版、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白山出版社2008年版、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

在系统梳理《旅顺口》中文版本的嬗变过程之前，有必要对1947年版《旅顺口》的出版机构和译者做一简要介绍。有关该书的出版机构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有专门介绍，称该单位是“苏联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以各种语言出版面向国外读者的外文书籍的机构。40年代到50年代初出版的中文书籍，主要是马、恩、列、斯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苏联的政策文件、政治书籍，以及《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旅顺口》等苏联文学作品”[③]。在此需要补充的是，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是一家带有鲜明苏联官方色彩的出版机构，即便是其出版的文学作品，往往也带有外宣性质，与苏联的官方诉求相呼应。例如在其1942年

出版的《游击札记》中就有这样一段广告语式的推介文字:“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最近出版了许多描写苏联人民伟大保卫祖国战争英勇事迹和人物的文艺著作。中国读者必须人手一卷。”④其中列举的书目包括郭洛多威科夫的《战斗与行军》、里多夫的《丹娘》、西蒙诺夫的《在皮特撒姆路上》等。联系该书出版的二战时代背景,不难看出荐书背后蕴含的政治诉求。

1947年版《旅顺口》的译者是苍木,苍木为陈昌浩的笔名。有关陈昌浩的翻译经历,现集中见于范青所著的《陈昌浩传》和范青、陈辉汉合著的《陈昌浩革命生涯》。这两部作品为我们了解陈昌浩的翻译状况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细节。其中,《陈昌浩革命生涯》在《陈昌浩传》的基础上,对陈昌浩的翻译状况进行了相对详细的介绍。据该书所载,陈昌浩于1939年在延安获批赴苏联治病,其后留寓苏联,至1952年方才回到中国。其间,“1943年6月,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原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他回国以前,把李立三、陈昌浩和冼星海等人陆续找回莫斯科,安排在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工作,陈昌浩负责该社中国部翻译工作”⑤。《旅顺口》便是在这期间翻译的。

《陈昌浩传》和《陈昌浩革命生涯》均明确表示,陈昌浩即为《旅顺口》的译者。不过,在李立三夫人李莎的回忆录中,也有一段关于该书翻译过程的叙述。据李莎回忆,“当时立三和C君一起翻译了一部苏联长篇小说《旅顺口》”⑥。可见,《旅顺口》的翻译并非个人化的文学行为,而是一种组织化的政治行为。另外,与文艺著作相比,马列主义著作在陈昌浩的翻译工作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就目前所见,他译校或参与译校的马列主义著作包括《列宁文选》《论共产主义教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据《陈昌浩传》载:“在居留苏联的这几年里,他的译著先后在苏联出版,又通过国境线输入到中国的大后方发行,并且冲过敌、伪、顽三种势力的层层封锁,向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还通过‘油印’、‘石印’、‘传抄’等方式,使他翻译和著作的马列主义读物在抗日军民中传播着。”⑦考虑到这些著作在当时及之后所发挥的作用,《陈昌浩革命生涯》将陈昌浩留寓苏联期间的翻译工作视为“真理的媒介”“友好的桥梁”,将陈昌浩翻译的著作称为“宝贵的精神武器”,称他“在文化战线上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⑧

作为一部苏联方面面向中国读者出版的文学著作,1947年版的《旅顺口》装帧考究,硬壳精装,在每编开头还配有简笔插画。译者译笔较为成熟,且采用注释的形式,对中国读者可能存在隔膜的习俗、地域、事件等进行说明。与1947年版小说相比,1954年版小说出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恢复了陈昌浩的本名作为译者。《陈昌浩革命生涯》中载,1953年陈昌浩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翻译了《宁死不屈》和《旅顺口》(上下册)等苏联的文艺著作”⑨。1954年版的“出版说明”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印行的这个中译本,是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的中译本重排的,重排之前,曾将全部译文加以整理,并增加了一部分的注释。”⑩从内容上看,1954年版小说与1947年版小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1947年版开篇如下:

晴明寒冷的一天,快到傍晚了。夕阳照着旅顺口和四周暗淡的岩山。海上吹来一缕缕的微风,拂扫着地上的余雪。⑪

在1954年版中被改为:

这是晴朗寒冷的一天,快到黄昏了。夕阳照着旅顺口和四周暗淡的山岩。海上吹来一缕缕的微风,拂扫着地上的余雪。⑫

二者虽然在文字表述方面有所不同,但所表达的意思实际上没有本质性区别。1954年版小说的译文整理大多属于这种类型。通读两版小说,很难断言二者的译笔孰优孰劣。不过,也有部分文字因为翻译上的区别,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体验上的差异。

例如1947年版中的:

——只让我把这收拾起来，——副官抬起手来，这时海军大将看出，他胸上挂的那个“朝日”章上染满了鲜血。

东乡厌恶地擦去这块血，又很惋惜地望着自己那染上血的雪白制服。

在1954年版中被改为：

“先让我把这个拿掉。”副官抬起手来，这时海军大将看见自己胸上挂的那个“朝日”章上粘着一块鲜血淋淋的人肉。

东乡厌恶地用指头把它弹掉，又很惋惜地望着自己那染上血的雪白制服。⑭

将“鲜血”改为“人肉”，将“擦去”改为“弹掉”，强化了战争的残酷性，进一步突出了东乡平八郎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增强了对读者的冲击力。

与上述差异相比，两版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1954年版小说文末增加的文字。《旅顺口》是以“尾声”作为结尾的，在1947年版小说的“尾声”中，作者介绍了旅顺战役的后续结果，评析了俄方在日俄战争中的功过得失，歌颂了俄国官兵的“真正本领”。但在1954年版的“尾声”中，增加了如下数段重要的文字：

忠于盟约的苏联，于一九四五年对武士道的日本宣战。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溃了日本最强的军队——关东军。只需一星期多的时间，日本的军队就被打败，在红军与红海军强大的攻击下，日本终于投降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红军的空运部队在旅顺口着陆，金山上立刻飘扬起了苏联的红色的旗帜。

九月二日，日本承认战败，并且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

为了防止日本的再度侵略，并且为了巩固苏联和中国在太平洋上的安全，中苏两国在旅顺口解放后曾利用旅顺口作为远东的海军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在四十年前俄国舰队停泊的地方，百战百胜的苏联舰队抛下了铁锚。他们开到了这里，是为了保卫祖国苏联的和平与安全。

中国人民战胜了国民党与美国反动派的联合力量，这是一九四九年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苏联人民万分欢欣地迎接了这个消息。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在他们的领袖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斗争，永远怀着关切与尊敬的感情。

中苏两国人民互相友好合作的意向和保障和平与安全的愿望，表现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

苏联尊重中国人民的国家独立、权利与利益，决定将旅顺口和大连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的海军与中国的战士在旅顺口见面了。

在古老的要塞地区，在墓地上，苏联的海军看见了俄罗斯战士坟墓上的十字架，他们不禁以自己的人民自豪，并且对他们在俄日战争中阵亡的父亲与祖父的英勇功绩怀着崇高的敬意。⑮

这些在小说中略显突兀的文字具体源于何处，暂不可考，但就其内容和表述方式推断，大概率为中方整理重排时专门添加的。这段带有鲜明中苏同盟时期特色的文字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以经典的反法西斯叙事和反帝反封建叙事相结合的方式，论证苏联相关军事行动和中苏同盟关系的正当性。其二，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节点”和“开端”意义，将旅顺口作为象征性地标，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其三，剥离苏联与沙俄在政治、政策层面联系的同时，强调其人民的延续性，进而对苏联和苏联人民进行歌颂。“尾声”中增加的“金山上立刻飘扬起了苏联的红色的旗帜”⑯，既象征着反法西斯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同时也是对小说中“黄金山那高耸着的信号旗杆上，放下了俄国军旗，悬上了日本军旗”⑰的回应，暗示了苏军进驻旅顺口所蕴含的“雪耻”意味。

事实上，如何处置旅顺口，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过程中双方充满矛盾的焦点问题。《中

苏关系史纲》中称，中方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中提出了“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问题后，斯大林“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划掉了，还打了许多叹号和问号，字里行间渗透着他的恼怒和愤慨”。[18]后续双方就相关问题展开了多次会谈与争论。虽然最终苏联方面出于现实考虑做出了让步，但中苏双方的利益冲突在条约签订的过程中被凸显出来，也间接推动了朝鲜战争及后续历史事件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1954年版小说“尾声”中增添的文字，其实是一种高度策略化的政治修辞，其主要目的是对读者的情感进行引导，服务于中苏同盟的时代大背景。

二、文本的多重本土化改造

1947年和1954年两版小说构成了中国方面后续进行文本改写、改编的基础版本。继1954年版《旅顺口》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于1962年出版了改写版的《旅顺口》。该改写本强调，“改写是本着压缩文字，突出军事斗争场面、吸取经验教训，并适当保持其基本上是一部文艺作品的原则进行的，对原作品中一些非军事斗争活动、不必要的情节、不必要的人物活动和不适当的歌颂作了较大的删节”[19]。从内容上看，1962年版缩改幅度很大，不仅将原书的四个主要部分缩改成了十二小章，还从军事角度出发为各章单独命名，同时在书中插入了多张军事地图。凡是与战争缺乏直接联系的文学书写，基本上均被删除，有关战争的文学细节也被大幅简化。该书专门总结了旅顺战役中日军的主要战术特点和俄军失败的原因，力图使小说作为军事参考资料的功能达到最大化。

书中特别指出，小说“不适当地歌颂了帝俄某些将军、军官和士兵为沙皇卖命的英雄主义与高度战斗精神”[20]。此外，书中还着重强调，研究相关战争经验“对于加强战备观念，防范敌人突然袭击，粉碎帝国主义可能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完成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安全的神圣任务，仍具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21]。与前两版相比，1962年版中的相关表述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不仅正面批判了作品当中存在“不适当的歌颂”的问题，还有意识地将文本的阅读价值导向了“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安全”。由此将《旅顺口》这部苏联小说改写成了巩固本国国家安全的军事工具书。

与1962年版的《旅顺口》相比，2000年版的《旅顺口》中流露出中国编注者更为自觉的本土意识。编注者明确表示，该书“强烈地散布着殖民思想”“必须给以批判”。因此，编注者采取了“对某些语段加了历史的评注，以反映历史真实；对书中散发的殖民主义思想作了批注”的方式，对小说进行整理重印，以期使小说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发挥积极作用。[22]正因如此，2000年版《旅顺口》的注释较之先前的版本有了大幅增加。这些注释中相当一部分正如编注者所言，是对“书中散发的殖民主义思想”作的批注。例如，书中有一段正面人物康特拉琴珂面向水兵的演讲：

> 你们要来继续捍卫高山。大家记着，如果高山失守，那就等于舰队毁灭。我指靠你们，也如同指靠自己的步兵一样。我们祖国委托你们来保卫旅顺口，所以我坚决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像坚守高山这样，来坚守旅顺口的。[23]

对于这段演讲，编注者批注如下：

> 旅顺口俄国军人的英雄主义通过殖民主义思想得到了高度的反映，而其殖民主义思想也通过英雄主义得到了充分的散发。中国人看这部小说是一部写得成功的小说，但也是在看一部屈辱的历史。[24]

在此，编注者致力于发掘文本的教育和警策价值，希望通过批注引导读者跳出作者的叙事逻辑，向读者传达编注者的理念。正如编注者在该书“出版说明”中所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俄战争虽已过去近百年，但它是中国人民的一面透彻的镜子，用它，可以了解祖国曾受过的帝国主义的欺凌；用它，可以认识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性；用它，可以知道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用它,可以认识到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性;用它,可以知道腐败的罪恶”[25]。为《旅顺口》添加相关评注和批注,能够使读者进一步意识到文学文本与真实历史间的密切联系,达到用小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塑造国民历史观和国家观的目的。如此,为小说加注,就使小说在作为历史注脚的同时,成为特定历史观念的注脚。与1962年版小说为文本内容做“减法”的改造思路相反,2000年版小说通过添加注释为文本内容做“加法”,在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的同时,达成了文本改造的目的。

2008年版的《旅顺口》是1962年版小说的再版。该版小说由白山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的主办单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部。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表示,将此书重印再版的目的是“供读者作为学习军事的参考”[26]。除此之外,与1962年版相比,该版还在“出版说明”中对作者斯捷潘诺夫进行了简要介绍。

2014年版和2015年版的《旅顺口》均为基于小说改编的连环画,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2014年版为上下两册装,开本为1/32;2015年版则为单册装,开本为1/50。与前者相比,后者更便于携带和翻阅。两版作品的前言称:“百年之后,中国开始强大起来,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亚洲及国际事务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声音’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和重视,中国再也不是百年前那个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中国。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回顾这段罪恶的历史,我们仍要牢记周恩来总理的教诲——‘以史为鉴,牢记国耻,不忘历史上的教训。’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百年前的覆辙,才能振兴中华,强我中国!”[27]与2000年版的小说相比,中国声音、强国意识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内容在文本中得到强调。从内容上看,两版作品的本土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叙事本土化。与1962年版小说相同,这两版作品同样对小说进行了缩改,不同之处在于,1962年版的改写主要基于军事层面的考量,这两个版本则偏重于强调民族和国家意识。作品开篇写道:

在我国北方有一个天然的不冻港——旅顺口,历史上它是北洋海军的重镇,也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主战场。1904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领土,在旅顺口进行了一场战争,给旅顺口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这是民族的耻辱![28]

作品结尾则对篇头的文字进行了呼应:

1945年8月24日,苏联红军空运部队在旅顺口着陆,金山上飘起了苏联红色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谈判,旅顺口终于在1955年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29]

在此,原作者斯捷潘诺夫的叙事声音为编者的叙事声音所取代,原作中的苏联视角被转换成中国视角,使得作品的叙事基调和叙事逻辑发生了根本转换。

其二,视觉本土化。2014年和2015年的两版作品均采用传统的“小人书”形制,图像和文字共同构成了作品的叙事主体。众所周知,连环画在中国是一种极具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通俗艺术形式,连环画以其插图直观传神、文字通俗易懂、便于携带阅读等特点而广受欢迎,在传播思想文化、教育教化读者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据该书介绍,编者勇本忠曾策划出版过《保卫延安》《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再版连环画;绘者阎峰樵的连环画作品包括《特派员落网记》《英雄民兵王寿波》等。正因如此,两版连环画从装帧到绘画再到文字,均与传统的红色经典连环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连环画的形制,使其更加适宜各年龄段的读者阅读,同时也能够唤起特定读者群体的阅读情感和阅读记忆。

综上所述,《旅顺口》被译介至中国后,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中国化过程。小说最初是在苏联对外输出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被译介至中国的。其后随着中苏同盟关系的确立,《旅顺口》也增加了顺应该

同盟关系的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时代背景下,《旅顺口》被缩改成军事参考资料。“苏联文学热”冷却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方面又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造和再利用,使之成为服务于国防和意识形态教育的文本。在不同时期,小说的改造方式和方向虽然存在差别,但是,基于中国特定时期的现实需要来对待和处理文本的底层逻辑,在文本改造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

三、基于时代需要的政治化改造

《旅顺口》的中文译介和中国化改造,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国家建设进程密切相关。贺桂梅认为,“当代文学取代现代文学并自我生成与展开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或文艺实践,而是整体性的人民政治实践机制的内在环节”[30]。就此而言,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当代”和“文学”均先天具有特定的政治属性,其自我生成与展开均与政治实践存在联系。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当代”并非只是特定文学形态或文学时段的指称,还是支持文学生产和再生产的基质。就其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而言,“当代”作为特定的能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副产品和组成部分,其生成脉络深植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治实践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在生产和变革“当代”的同时,形塑了“当代”文学的存在空间和存在方式。

李建军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受俄苏影响巨大。从影响的性质来看,俄苏给中国带来的是“社会关系和制度层面的巨大变构,是道德意识和生活观念的根本改变”,这种变构和改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文学促成的。在文学层面,“整体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根”,“是扎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土壤上的。中国新型文学的主要观念和理论资源,主要的制度性建构资源,几乎全都来自苏维埃俄罗斯文学”。[31]中国当代文学建构自身的资源,并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文学,而是涵盖了更为广义的文化和社会领域。俄苏文学一方面在文学层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在参与重构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以政治化的方式在广阔的社会领域辐射至中国当代文学,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生成与展开的逻辑。如果将“当代”视为文学生产的基质,那么俄苏文化和文学则是这一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旅顺口》的中国化虽然是一种政治行为,但同时也是一种参与建构“当代”的文学行为和社会行为。

因此,虽然《旅顺口》的中文译介并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产生直观影响,但文本本土化改造过程中呈现出的强烈政治属性,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典型文学景观。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依托政治逻辑对待文学译介的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对苏联文学进行大规模的译介和重译,其中既包括《伊戈尔远征记》《家庭纪事》等文学经典,也包括大量平庸之作。而在20世纪80年代,叶赛宁、左琴科、阿赫玛托娃、扎米亚京等曾经不为中国重视的苏联作家则受到关注。政治因素在其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洪子诚认为,中苏文学关系有“国家设计的性质”,中国文学“苏联化”是“全面、整体的,但也是经过筛选的”,“苏联提供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就经过阐释性的选择,而接收方也并非照单全收”。[32]就《旅顺口》而言,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是其被译介至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蒙诺夫表示,斯大林本人“曾支持过或亲自推荐过许多历史作品参加评奖”,获奖作品背后“有着非常当代的政治课题”,《旅顺口》的获奖过程是“斯大林对历史作品的功利主义观点的证明”,“它不早不晚正好在打败日本之后的1946年获奖,斯大林提出的任务:清算1905年旧账,夺回旅顺口,这时都已完成了。对于他喜欢的这本书,在1942年或43年斯大林完全可以说:现在我们是否需要它呢?那时候,特别是1943年初以前,鲍卢斯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之前,是否需要让人们想起旅顺口的陷落呢。但是1946年斯大林认为,这本书的用处在于它具有某种

极端的当代性，它可以使人想起40年前沙皇和沙皇俄国所失掉的东西，斯大林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现在夺回来了；使人想起那时候也有像这次战争中苏军官兵一样勇敢作战的军官和士兵，但是他们在另一种指挥、另一种领导之下却不能获取胜利”。[33]在这一表述中，《旅顺口》获奖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斯大林对文学的实用主义态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苏联在国家意识、政治政策方面与沙俄存在的关联性。

由于《旅顺口》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经由特殊渠道译介至中国的，因此最初并没有经过国家层面的制度化筛选，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作品中的殖民主义倾向很快便激起了中方的反应。有关中译本《旅顺口》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出自政治领域。据《周恩来年谱》所载：

1950年12月：

某夜，和身边工作人员交谈对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旅顺口》的看法，说：书是我今年一月去苏联访问时在火车上看完的。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思想，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书中的英雄马卡洛夫，只不过对腐朽的沙俄军队制度做过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比那些将军们稍好一点，但对沙皇的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这本书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把中国人都描绘成坏人，实在令人气愤。[34]

1956年3月8日：

同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部分理事座谈。在谈话中说：苏联作家写的《旅顺口》这部小说，是宣传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为沙皇侵略战争歌功颂德的。书里的康特拉琴珂根本不是英雄，他是沙俄的侵略工具。列宁在《中国的战争》里提到，欧洲资本家的魔掌伸向中国，侵略中国的旅顺口。沙俄和日本争夺旅顺口，他们都是侵略者。书里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好的，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歪曲。[35]

周恩来的相关评价成为中国方面后续评价《旅顺口》的重要参考。在裴兆顺的《评小说〈旅顺口〉》[36]、蓝英年的《“〈旅顺口〉是一本坏书”》[37]等代表性文章中，周恩来的相关评价得到强调和进一步阐发，再加上各版小说中的出版说明，中国方面形成了立足国家和民族评价《旅顺口》的基本立场。在内容方面，《旅顺口》的确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一，作者在小说中抒发了强烈的国家和民族自豪感，反复借小说人物之口对俄国进行歌颂。其二，阶级意识贯穿始终。小说中的下层官兵多为正面形象，上层军官中除少数亲近下层官兵者，几乎均为反面形象，阶级矛盾是小说描写的重点。其三，小说在苏联出版时，具有很强的“当下性”。作者在小说中除正面抨击日本外，还采用多种方式对德国进行了抨击。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典型傅克，是一名拥有德国血统的俄国高级军官，小说后半部分更是借康特拉琴珂之口表示，“德国人任何时候也不是我们的朋友”[38]。相关书写很难说与现实中苏德之间的国家关系以及苏德战争的时代背景无关。

在中国方面，小说中歌颂俄国下层官兵和俄国人民的内容得到肯定，而歌颂俄国这一政治实体的内容则遭到否定。至于许多在苏联语境当中具有“当下性”的内容，则不被中方重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接受《旅顺口》的主要逻辑是：一方面有选择地接纳小说中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另一方面排斥小说中具有俄国中心主义倾向的政治性内容。

埃娃·汤普逊表示，俄国文学和俄国殖民主义存在联系。她认为：“文学是民族同一性的主要构成板块，也是它的一种表现。对于胜利与失败的态度在各个民族那里是大不一样的。部分的是以文学中记载的方式为依据的。对于民族同一性的铸造，战争显得至关紧要，不论是战胜还是战败。对于这些战争的记忆，在辞令上，是得到了民族精英的美化的。这些加工促成了横向和纵向的民族气质，因而还有

民族认同感，但是它们产生的行为模式却是十分不一样的。在其全部历史中几乎一直持续地进行过侵略战争、并且以同样激情纪念胜利与失败的那些民族群体(例如俄国人)，都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民族认同感。”[39]不管是对沙俄还是苏联而言，战争和对外扩张的意义指向通常都不只是向外的，而是内外兼顾的。维持国家统一稳定和民族同一性的意识形态诉求在渗入国民集体潜意识的同时，影响了作家创作的思维和逻辑。

事实上，对于其他拥有帝国传统的国家而言，在维系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方面也存在和俄国相似的处境。中国在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需要文学的力量。这种需求是主义(社会主义)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在一众反映日俄战争的中外小说中，为什么《旅顺口》在中国获得了不断再版、改写和改编的机会。以《蜗触蛮三国争地记》为例，作品虽不乏文学特色，但传统文言的表达方式，短小的篇幅，寓言化、戏谑化的文风，使其无法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且文中贯穿着清廷立场，结尾更是直接表达了“征二国奉藩返侵地 朝四夷垂拱颂光天”[40]式的帝国极端幻想。又如《肉弹》，虽然曾被中国方面用来进行国民性改造，且中国在抗战时期还曾出现过《肉弹》的同名剧本，[41]但书中“彼忠君殉国、几万忠义将卒之名、实芳传千岁、辉映万世、而后世子孙当永远相传其勋绩而无忘之之时欤”[42]式的主题思想，蕴含着直观而强烈的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且中日关系也不同于中苏关系。相较之下，《旅顺口》比上述作品更加符合中国塑造国民的需求。

董炳月认为，“在民众被高度‘国民化’的时代，作家不可避免地被‘国民化’，于是成其为‘国民作家’。‘国民’的内在规定性、话语行为主体与这种内在规定性之间保持怎样的关系，决定着话语行为的基本内容”[43]。不管是樱井忠温还是斯捷潘诺夫，其作品的生产和传播均受到国家力量的影响和规约，彰显了各自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对于中国而言，《旅顺口》是一部兼具“人民”和“国民”双重属性的作品。中国和苏联共享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前者对后者带有“人民性”特征的文艺作品采取接纳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又基于国家立场，排斥与本国利益、需求相悖的文艺内容。中国基于政治逻辑对《旅顺口》进行的本土化改造，反映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诉求，以及在接受外来文艺资源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采取的解决方法。

那么，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旅顺口》的文学水准到底如何？中国虽然对《旅顺口》中的部分内容和思想进行了批判，但总体肯定其文学价值。在2000年版的《旅顺口》中，编注者仍专门强调，“由于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于1946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44]。事实上，作为一部历史军事题材小说，《旅顺口》的文学高度与《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俄苏文学经典存在较大差距。放在世界文学坐标中衡量，也与《西线无战事》《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相似题材的作品存在一定差距。对于小说中涉及的战争、人性、爱情等主要命题，作者均缺乏深层的思想和审美观照，而基本停留在表层书写和基于意识形态立场进行价值评判的层面。作品的文学水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塑造了立体饱满的俄国下层官兵群像，二是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旅顺争夺战的战争风貌和战斗细节。这些与作者本人童年时亲历旅顺战役以及从事过军人和工程师职业相关。[45]因此，斯捷潘诺夫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验书写，《旅顺口》的文学高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经验书写的限度。当然，任何一部经典抑或非经典，文学抑或非文学作品，都存在多种评判和解读的可能。面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秉性、职业、需求各异的读者，能够从中收获不同的内容和感受。《旅顺口》这部带有鲜明苏联印记的小说，最终以一种非文学的、夹杂着批判和改造的方式，在中国获得了“新生”。

注释：

①参见阿·斯捷潘诺夫：《旅顺口：历史小说》，赵毅芳、李世骏、曹峨编注，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斯捷潘诺夫传略”第9页。

②斯杰泮诺夫：《旅顺口》，苍木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7年版，扉页。

③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43页注释1。

④依里亚·库仁：《游击札记》，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2年版，第51页。

⑤范青、陈辉汉编著：《陈昌浩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页。

⑥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李英男、姜涛编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⑦范青：《陈昌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页。

⑧范青、陈辉汉编著：《陈昌浩革命生涯》，第442、527页。

⑨同上，第461页。

⑩斯杰泮诺夫：《旅顺口》，陈昌浩译，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本书出版说明”第2页。

⑪斯杰泮诺夫：《旅顺口》，苍木译，第7页。

⑫斯杰泮诺夫：《旅顺口》，陈昌浩译，第3页。

⑬斯杰泮诺夫：《旅顺口》，苍木译，第524页。

⑭斯杰泮诺夫：《旅顺口》，陈昌浩译，第531页。

⑮斯杰泮诺夫：《旅顺口》，陈昌浩译，第1074–1075页。

⑯同上，第1074页。

⑰同上，第1072页。

⑱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⑲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部军事科研处编译：《旅顺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1962年版，“前言”第7–8页。

⑳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部军事科研处编译：《旅顺口》，“前言”第7页。

㉑同上，第182页。

㉒阿·斯捷潘诺夫：《旅顺口：历史小说》，赵毅芳、李世骏、曹峨编注，“出版说明”第5、7页。

㉓同上，第832页。

㉔同上，第832页脚注①。

㉕阿·斯捷潘诺夫：《旅顺口：历史小说》，赵毅芳、李世骏、曹峨编注，“出版说明”第6页。

㉖斯捷潘诺夫：《旅顺口》，柯岩初译，白山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说明”第2页。

㉗阿·斯捷潘诺夫：《旅顺口(上)》，勇本忠改编、阎峰樵绘，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1页。

㉘同上，第1页。

㉙同上，第321页。

㉚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

㉛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版，第8、11页。

㉜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

㉝康·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裴家勤、李毓榛译，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63–164页。

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㉟同上，第555页。

㊱裴兆顺：《评小说〈旅顺口〉》，《辽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㊲蓝英年：《“〈旅顺口〉是一本坏书”》，《博览群书》1998年第5期。

㊳阿·斯捷潘诺夫：《旅顺口：历史小说》，赵毅芳、李世骏、曹峨编注，第842页。

㊴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㊵虫天逸史：《蜗触蛮三国争地记》，载《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神怪小说大系·寓意卷(2)：奇天异地》，陈年希等校点，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383页。

㊶参见董炳月：《“肉弹”伦理学》，《读书》2004年第4期。

㊷櫻井忠温著并画：《旅顺实战记》，黄郛译，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197页。

㊸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8页。

㊹阿·斯捷潘诺夫：《旅顺口：历史小说》，赵毅芳、李世骏、曹峨编注，“出版说明”第5页。

㊺同上书，“斯捷潘诺夫传略”第8–9页。